

“躺平”暴露多重后遗症 世卫组织发出警告



图为2022年3月24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名新冠病毒检测站的工作人员为一名男子检测。

新华社发

□ 本报记者 吴琼

目前,新冠病毒及其重组变异毒株仍在全球肆虐。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强调,新冠疫情大流行仍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为此多次敦促各国政府,在防疫措施方面仍要保持足够警惕和充分准备。然而,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取消防疫措施,采取“与病毒共存”模式。

目前,这种模式的后遗症已经陆续显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病例数激增,死亡人数攀升,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为此,全球多位公共卫生专家呼吁,“应重建公共卫生措施,而不是让公众自己承担风险”。

病例数激增死亡数高企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累计已超过5亿,死亡病例逾622万。连日来,世界卫生组织和多国公共卫生专家反复强调,新冠疫情大流行远未结束,预计新冠病毒仍将继续演变,人们将看到更多的变异毒株出现,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依然很高,过早放松社交限制措施存在很大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随时

做好准备,加强公共卫生应对措施,遏制病毒传播。

然而,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找不到防疫理想策略,加之存在抗疫疲劳心态、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并抱有“奥密克戎毒株致病性弱”的侥幸心理,陆续取消了口罩令、隔离感染者、追踪密接者等管控措施,除加强疫苗接种外基本不采取防控措施。

事实很快证明,“躺平”非但不是防疫的可选项,而且是大谬之举。“躺平”之后,随即出现的便是病例数激增,死亡病例数高企。

以美国为例,由于取消口罩令、关闭新冠监测点,4月美国多州新冠确诊病例数攀升。《今日美国》对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数据的分析表明,有32个州最近一周收治的新冠确诊病例数多于前一周,15个州的医院重症室已收治更多的确诊病例。此外,美国是新增死亡病例数最多的五个国家之一,每日新增死亡病例在500例左右。

美国传染病首席专家福奇近日预测,未来几周美国的确诊病例或会显著增加,秋季可能再次激增。对于原因,福奇坦言,这可能和多地放松室内限制措施及解除口罩令等因素有关。

事实一再证明,有效的防控措施,及时的核酸检测和公平的疫苗接种仍是目前全球科学防疫应当采取的举措。

“躺平”留下诸多后果

无论在全球民众健康面临的安全风险,病毒持续变异带来的未来挑战,医疗系统面临的巨大压力,还是从多国经济社会生活遭受的严重冲击来看,“躺平”模式都给全球抗疫进程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躺平”抗疫留下的多重“后遗症”还将陆续显现。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对该组织监测疫情趋势能力的减弱表达了担忧之情。他说:“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病例激增情况,这给医疗系统带来压力。由于新冠病毒检测数量显著减少,我们监测疫情趋势的能力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躺平”带来的疫情形势起伏,还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抗疫压力。

即便是选择“躺平”的国家,也不得不面对诸多“后遗症”带来的巨大压力。

以2月末宣布实施“与新冠共存”计划的英国

为例,其医疗系统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新冠病毒感染水平及医护人员高病假率,令英国医疗体系处于艰难运转的状态。不仅是医院,就连学校和企业都很难维持正常运转,“有十分之一的人在生病”。

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因感染新冠而遭受长期症状的影响。有研究显示,五分之一新冠住院患者在5个月 after 仍不能工作,由于长期健康状况不佳而没有工作或在寻找工作的人增加了20万。

韩国放宽防控政策与措施后,多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10万例,确诊感染学生数量成倍增加,除学生和儿童外,“躺平”政策对老人、有基础疾病者和免疫受损人群等群体造成了极大风险。目前,韩国医疗系统承压严重,各行各业都难免被疫情波及。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一些选择“躺平”的西方国家在疫情造成的多重“后遗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面对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的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BA.2,一些“躺平”的国家正经历抗疫政策反复的“拉锯战”。

埋下更多公共卫生隐患

当前,新冠病毒仍在快速传播。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躺平”之举将给全球民众带来更多公共卫生隐患。

作为一个与全球流行病防范密切相关的国际联盟,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哈切特就持有类似观点。他指出:“只要病毒传播率很高且存在未受保护的群体,就会创造一个有可能出现病毒变异的环境,病毒会不断进化,不可预知的病毒可能在任何时间造成大流行。”

谭德塞近日也反复强调说:“因新冠疫苗接种率高等因素就认为疫情已经结束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他指出,一些国家和地区放松了公共卫生和社交限制措施,造成病毒继续传播,并带来新病毒变种出现的风险。

连日来,英国利兹大学医学院病毒学专家斯蒂芬·格里芬等全球多位公共卫生专家同样警告说,新冠病毒仍在持续变异,疫情形势存在不确定性,过早放松社交限制措施存在很大风险。

格里芬还批评英国政府取消防控措施并推出“与新冠共存”计划无异于无视新冠病毒的持续快速传播。他敦促选择“躺平”的国家“应重建公共卫生措施,而不是让公众自己承担风险”。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大流行突发事件委员会所言,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住院人数、重症监护人数及死亡人数增加,并影响到医疗系统的处置能力,各国应继续采取基于证据和风险性的公共卫生和社交限制措施,如戴口罩、居家隔离、勤洗手和改善室内通风等,并随时准备根据病毒和人口免疫力的变化,迅速强化相关防疫措施。

监管机构“开绿灯” 妄图造成既成事实

日本政府仍一意孤行推进核污水排海计划

□ 本报驻日本记者 冀勇

近日,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海计划作出“大致同意”决定,使核污水排海计划再次取得实质进展。日本政府无视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一意孤行推进核污水排海,妄图造成既成事实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监管机构给排海背书

15日,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大致结束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审查,作出了“大致同意”决定。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对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京电力)核污水排放计划“大致同意”,将于下月出具事实上表示合格的审查结果。在获得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和福岛县等地政府同意后,东京电力将启动排放计划。按计划,东京电力将于明年春季正式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在4月中旬前后完成所有设备安装和工程施工等。

日本《福岛民友》在报道中指出,在获得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认可后,东京电力希望在6月正式启动核污水排海相关设备的安装工作,但在此之前排放计划能否获得地方政府同意将成为焦点。

对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作出“大致同意”的决定,日本国内存在众多质疑,认为决定只是为东京电力排海计划背书。

众所周知,成立于1951年的东京电力作为一个垄断性企业,其背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商利益集团。东京电力通过向政党提供政治献金和选票支持,不仅对负责核电监督的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和内阁府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施加影响,甚至直接参与国家核电政策制定。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日本政府设立“日本原子能损害赔偿和反应堆报废等支援机构”,持有50.1%东电股份表决权,实际将东电纳入政府支配之下。



图为抗议者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外反对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因与东京电力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原子力规制委员会作出的“大致同意”决定事实上只是走程序,严重缺乏科学依据。东京电力不断主张核污水的绝对安全与核电站事故发生前制造的核电安全神话如出一辙。

排海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核污水排海问题上,国际社会有很多研究机构发表研究报告,证明核污水中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危险性,但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对此充耳不闻,一意孤行按照预定时间推进排海作业。

在推进核污水排海前,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核污水是否绝对安全。尽管东京电力和经济产业省主张“核污水中氚的浓度仅为排放标准的四十分之一,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应用水标准的七分之一”“日本国内的核电站四十年来一直在排放含有氚的水,没有发现对健康造成影响”,强调排放的安全性,但必须认识到此次核电站事故产生的核污水是水与熔毁后的核燃料

棒直接接触的产物,含有碘131等62种放射性物质和碳14等,日本放射治疗第一人的北海道癌症中心名誉院长西尾正道指出,氚在人体内与蛋白质和脂肪等有机物结合,形成的有机氚在进入细胞核后会给DNA造成损害,严重威胁人体健康。

二是核污水排海是否穷尽了所有手段。日本《女性自身》杂志报道说,东京电力和经济产业省针对福岛第一核电站不断增加的核污水感到头疼,2013年成立了专家会议就处理办法进行讨论,最终确定了排海这一“低廉且简单”的办法。经济产业省给出的排海理由是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已没有地方可以建设存放核污水的储水罐,如果继续增加储水罐将给核电站废弃作业造成影响。从日本政府公布的资料看,针对注入地下、蒸发稀释、电解之后释放到空气等方法,东京电力根本没有纳入讨论范围。

三是福岛县青少年甲状腺癌发病率异常怎么解释。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福岛县政府委托福岛县立医科大学对事故发生时18岁以下的37万人实施的甲状腺检查发现,有237人

罹患甲状腺癌,发病率是事故前福岛县的数十倍,高于日本全国平均水平。对于核电站事故造成儿童罹患甲状腺癌几率增加,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已造成此类现象,福岛县的调查进一步证明放射性物质对人体健康,特别是儿童健康造成的损害。

想造成排海既成事实

在日本国内而言,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海面临的最后“障碍”是附近地方政府和渔业团体的反对。

福岛当地报纸《福岛民报》此前对县内59个市町村首长实施的问卷调查中,针对是否认为在核污水排海上与政府形成一致意见的提问,49个市町村首长表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占接受问卷调查总数的83%。这部分市町村首长中,大部分人认为政府对核污水排海的理由说明不充分,要求政府采取更多对策。

事实上,2015年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曾向福岛当地渔业团体承诺,在获得当地民众同意前不作出排海决定,但去年政府单方面决定排海,置信义于不顾。这次尽管民众中反对意见依然强烈,但日本政府可能会再次出尔反尔,强推排海。

此外,在获得国际社会认同上,日本政府几乎没有做任何努力。4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日本政府面对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民众的持续反对,迄今未对核污水排海方案的正当性、核污水数据的可靠性、净化装置的有效性、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等问题作出充分可信的说明。日方对各方关切置若罔闻,匆忙推进核污水排海的准备,强推排海方案审批进程,这种试图造成既定事实的做法是十分不负责任的。

汪文斌强调,日方应重视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民众正当合理关切,同包括周边邻国在内的利益攸关方和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寻找核污水的妥善处置办法,而不是固守并强推排海方案。在此之前,日方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水排海。

□ 本报记者 吴琼

阿片类药物成瘾是近年来美国日益凸显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白宫曾信誓旦旦地称,要管好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然而美国媒体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正在恶化。2020年至2029年期间,预计将有120万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

滥用药物致死人数上升

阿片类药物包括美沙酮、吗啡、芬太尼、杜冷丁等,主要用于治疗疼痛,但反复使用能使人成瘾。之所以说美国阿片类药物滥用成灾,是因为有数据显示,占世界人口总数不足5%的美国人,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

随着阿片类药物成瘾问题在美国愈演愈烈,由此导致的失能和死亡,让美国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近年来,美国因阿片类药物滥用导致死亡的人数连年上升。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1999年至2019年的20年间,近50万美国人因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死亡。而2020年的一年时间中,美国有超过9.3万人死于药物过量,平均每天致死超过250人,其中六成以上与阿片类药物芬太尼有关。2021年,美国因服用芬太尼过量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枪支与车祸死亡人数的总和。

当地时间2月11日,一项由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资助的研究表明,2020年至2029年期间,预计将有120万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朝野均认为,应对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已经刻不容缓。

美国时政杂志《新闻周刊》评论认为,美国政府必须引导民众真切认识到阿片类药物成瘾的破坏性,并采取减少供应、提供治疗等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此类药物给美国民众带来的危害。

相关制药公司面临大量诉讼

目前,美国很多阿片类制药和销售公司面临大量诉讼,指控他们在阿片类药物成瘾危机中推波助澜。强生公司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在阿片类药物泛滥中起到的推动作用,美国各州联合对强生公司提起诉讼。此后,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强生公司承诺缴纳50亿美元的罚款,以换取美国各州政府停止对其追究责任。然而,包括西弗吉尼亚州、纽约州在内的5个州随后又选择跳出协议,分别向强生公司提出独立指控。

当地时间4月18日,强生公司与西弗吉尼亚州达成和解协议,强生公司将向该州支付9900万美元,以换取西弗吉尼亚州不再追究该公司在助长阿片类药物泛滥中的责任。

无独有偶,2021年6月,强生公司也曾与纽约州达成金额达2.3亿美元的和解协议。根据协议,强生公司将解决与阿片类药物有关的索赔,并在9年内付清。

纽约市总检察长莱蒂蒂亚·詹姆斯在当时发布的声明中表示:“阿片类药物的泛滥给纽约州和全美其他地区的无数社区造成了严重破坏,数百万人沉迷于致命的阿片类药物。”

虽然美国多州已获得阿片类制药公司的和解赔偿金,但事实上,远远不能抵消滥用阿片类药物给美国各层级政府造成的沉重经济负担。据统计,美国每年因阿片类处方药物滥用造成经济损失约785亿美元,费用涉及医疗保险开销、成瘾治疗、司法调查费用等。

此外,阿片类药物滥用还影响美国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美国的经济发展前景。高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阿片类药物的过度使用,已经成为青壮年工人找不到工作或不愿就业的关键因素之一。

难以打破多方利益共同体

美国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起源于其国内普遍存在的滥用处方止痛药的传统,而这—情况又与美国阿片类药物制药公司的大力兜售甚至非法营销密不可分。

据悉,阿片类药物制造商美国普渡制药公司曾向医生发放所谓的疼痛管理宣传材料,宣扬“阿片类药物用于镇痛不会成瘾”。甚至这家公司还一度主导了相关文件的编写,确保开阿片类药物的医生不会受到处罚。

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制药公司不断向医生推销阿片类止痛药,而一些医生受到利益驱使,超开或滥开处方,并在面向病人的治疗咨询中极力宣传阿片类药物的强大镇痛作用而淡化其副作用。上述行为导致本来用于癌症等重症病人的阿片类止痛药被广泛地用于各类疼痛病症。

除了医疗系统及药品制造商被利益驱动外,美国国内阿片类药物泛滥还存在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升级,对美国传统工农业基地造成了一系列冲击。数据显示美国“铁锈带”及周边的阿片类药物泛滥最为严重。失业率高企,长期找不到工作的人们在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后,将阿片类药物作为麻痹自己的方式。

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在阿片类药物监管方面备受诟病。虽然美国政府也曾提出应对阿片类药物成瘾危机的相关计划,特朗普政府时期还曾因阿片类药物危机宣布全美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但由于事关商业利益,相关监管计划,措施一直遭到药企的抵制和质疑。

虽然美国历届政府都心知肚明,加强监管对于应对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但知易行难。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动员全美力量解决药物滥用问题。

还有声音指责称,在解决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上,美国历届政府往往只在口头上喊喊口号,并未真正付诸行动。

可以说,在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危机中,制药公司、药店和医生、监管者及立法者都脱不了干系,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同谋”。在药企与政界形成紧密利益关系的背景下,要解决阿片类药物泛滥危机,必须摧毁这种系统性腐败。

从美国危机说,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的控制并非一朝一夕,可以预见,在各方利益博弈中,滥用问题的解决之路势必困难重重。如若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理,那么阿片类药物泛滥危机将始终困扰美国社会。

政府监管缺位 美国社会阿片类药物滥用成灾